



李翔海 著

思想大师重读系列

SIXIANGDASHICHONGDUXIL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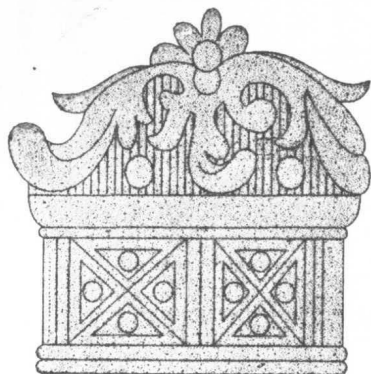


生生和谐

重读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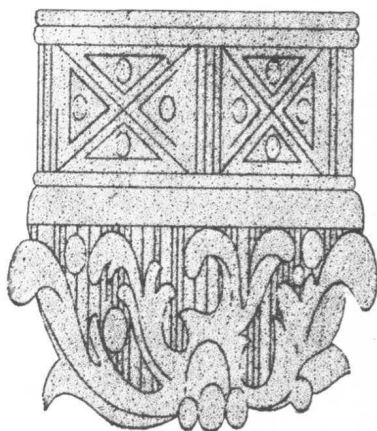
四川人民出版社

012250



生生和谐
重读孔子

李翔海 著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李远杰

封面设计：周宝工

技术设计：古 蓉

·思想大师重读系列·

生生和谐——重读孔子

李翔海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电话 6661236, 6666009)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蒲江新华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1.5 插页 字数 227 千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3144-0/B·119

印数：1—8000 册

定价：13.50 元

丛书出版前言

今天，愈来愈多深切关注人类命运的人士痛心疾首地振臂高呼：我们必须奋起抵御物质力量对精神家园的侵吞，我们要努力维护做人的尊严和人格的独立。这，在每一个热爱生命、珍视精神生活的人心中激起了广泛的共鸣。因此，“重建精神家园”成为当代中国人倾心相向的话题。

“精神家园”是一个宽泛的范畴，应该说它不仅包括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还包括各种价值观念的精神取向。放眼全球，可以说“重建精神家园”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在社会

F26/06

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发展的中国，“精神家园”的状况尤为复杂，新与旧、中与西混合纠缠，经济生活的嬗变对精神生活的震撼与冲击十分强烈，人们心目中的许多东西褪去了神圣的光环，却还没有找到一套取而代之的令人信服的观念体系。所以“重建精神家园”又是尖锐而迫切地摆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时代重任。

《思想大师重读系列》旨在针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境遇，有侧重地选择古今中外公认的思想大师，阐释他们闪烁着智慧光芒的人文思想，并引导读者阅览其原著精华。所谓重读必有新意：一是“读”的内容，我们解读思想大师，不是去研究其整个思想体系，而是重在发掘其人文精神的瑰宝；二是“读”的方式，我们并不用某一种固定的哲学观念去全面评判思想大师的思想，而是针对当今人们的精神现状，去寻求对我们有启迪、有裨益的思想财富。我们既是在寻找原汁原味的思想，又在用现代阐释学的方法，阐释这些思想的当代意义。

所以本丛书出版的目的在于两点：一是为重建精神家园输送可供参考的理论素材；二是为每一个追求精神生活的朋友，提供丰富多采的精神食粮。

思想大师不是随时出现的，他的出现需要主客观各种条件与契机，所以人类总是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产生一位思想大师。虽然我们拥有的思想大师是有限的，但古今中外思想大师的思想却超越岁月，突破地域，成为人们共同吸取的精神源泉，长久滋润着我们精神家园的思想之壤……

导 言

20 世纪无疑是一个“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时代。然而，儒学并没有由此而彻底没落。尽管早在世纪之初，“打倒孔家店”的狂潮怒涛就已经席卷了茫茫神州的每一个角落；尽管在某些西方人士看来，儒学的现代衰亡已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惟有最足以象征终点的特殊事件尚待决定”；但是，儒学在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动心忍性、复苏甦生、生长发荣之后，在人类走向 21 世纪的今天，又奇迹般地重新显示了内在蕴涵的坚韧的生命力。正像有人已经指出的，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反孔、批儒、避

“儒”惟恐不及的情状形成鲜明对比，在今天，以孔家的现代传人而自命又成了某些人附庸“风雅”的时髦。与此同时，孔子及其开创的人生智慧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一、悠远的现代回声

现代人对于孔子人生智慧的关注，根植于现代人的存在境遇。

20世纪既是人类取得巨大成就的时代，同时也堪称是现代文明流弊暴露的时代。一方面是人类的物质需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另一方面则是人类的精神与心灵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创伤。物质的丰裕并没有为人类带来普遍的幸福，在富国与穷国之间，以及同一国度的富区与贫区之间，一面是“朱门酒肉臭”，可谓穷奢极欲；另一面则依然是“路有冻死骨”，可谓极尽贫寒。高度的两极分化向人们展示的是一幅人类极不仁道的存在画面。高精技术的发展，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成为人类戕害同类的利器。两次世界大战，从未停息的社会动荡，堪称是创下了人类自相残杀的历史纪录。人本是自然之子，如今他却要以知识与技术为凭藉，希图翻做自然的主人。于是乎勘天役物、竭泽而渔，其结果则只能是打破了自然界本有的生态平衡，从而使人类面临到失却生存凭藉的危机。现代人从传统的“禁欲主义”的桎梏之中脱僵而出，弃理而纵欲，以至肆无忌惮、人欲横流，终于在抛洒尽生命的最后一丝激情后痛感到生命的无趣。除此而外，技术对人的主宰、金钱万能的驱动、人性的钝化与价值之源的迷失……无一不促使人们痛感人生意义的沦落：人生

在世，忙忙碌碌，来去匆匆，而又充斥着冷漠、厌烦、卑鄙、欺诈、痛苦、惊恐，其意义究竟何在呢？

20 世纪，无疑是西方文化做主导的世纪。然而，无论是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人生哲学还是后起的非理性主义的人生哲学，可以说都没有能够解决好人生意义的问题。正是对这一问题的不息追寻，不少西方有识之士开始把眼光转向东方。由此，孔子这位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命存在形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型塑了东亚社会传统的思想巨擘，继十七十八世纪之后，再次受到西方的热切关注，传出了对于孔子人生智慧悠远的现代回声。

80 年代初，美国出版了《人民年鉴手册》一书，书中将中国的孔子，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意大利的阿奎那，波兰的哥白尼，英国的培根、牛顿、达尔文，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康德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其中只有孔子一人是东方哲人，且被列为十大思想家之首。

1982 年，为庆祝孔子诞辰 2533 周年，美国各界人士在旧金山金门公园举行祭孔大典，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在专门发给大会的贺信中说：“孔子高贵的行谊与伟大的伦理道德思想不仅影响他的国人也影响了全人类，孔子学说世代相传，提示全世界人类丰富的做人处世原则。”

日本高桥教授认为，在欧美产生和发展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已经走投无路，而基于中国的相对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伦理，将会领导 21 世纪的世界文化。

荣获 1989 年度诺贝尔奖金的依来亚斯·哈内齐认为：“中国文化可能是世界上唯一能感召人们不要碌碌无为、不要虚度一生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把世间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放到生命里。”而在 1988 年 1 月在巴黎召开的一次世界性会

议上，许多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竟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如果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 2540 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

二、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之一

我们并不认为，人类即将进入的 21 世纪会是“孔家天下”。如上所述，尽管孔子的有关思想及其所创立的儒学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但这并不足以成为儒学将要充任整个人类的主导思想的见证。退而言之，不用说在全球范围内，即使仅在它的故土，尽管儒学的现代传人——现代新儒学已经由“寂寞孤怀”而发育为当今中国的一派显学，但是“儒门淡薄”的时代遗风并没有绝迹，儒学的全面复兴并没有充分的见证。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大力宣说儒家慧识、积极倡导“儒学之第三期发展”的杜维明先生也不只一次地坦言：儒学的复兴在目前只看得到“一阳来复”的希望，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至少要再过一百年以后，才会有某些明显的迹象。

当然，儒学所具有的内在生命力在今天已是一不争的事实。西方有识之士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热切关注，正是儒学之内在生命力的一种外在表征。儒学作为产生于人类思想之奠基期的思想传统之一，迄今已经有了二千多年的传承、发展的历史。在传统中国社会，儒学曾经长期成为意识形态化的主导思想，其影响及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在国民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与社会心理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中华民族之国民性与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也由此成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国文化之所以

为中国文化、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儒学尽管遭遇过佛学与玄学的挑战，但是儒家的传人们毕竟秉持了孔子以来儒家基本的人生智慧，通过出入佛老，“入其营而袭其垒”，终于得以以儒家为主体、为本位融合会通佛家与老庄，既保守了儒学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主干地位，又极大地充实了儒家内在的生命力。由此，儒学走出中国，走向东亚，成为传统东亚社会的精神动源之一。20世纪虽然是一个“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时代，但是正是透过这种惨淡的孤寂，儒学却在多元文化融合会通的时代背景之下表现出了“走向世界”的发展大势。

儒学作为一种“生命的学问”，它所具有的内在生命力莫不与作为儒学之创立者的孔子密切相关。在传统社会之中，孔子被人们尊称为“至圣先师”，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伟大的“职业教师”，而且是导引中国人自我生命之完成的伟大导师。孔子不仅给儒家学派奠定了学理上的基础，也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充满光辉的人格形象。几千年以来，儒学之所以代有传人，不仅在于人们服膺孔子所开启的儒家学理，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总有人由敬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者人格，进而达到与儒者在生命存在意义上的契接。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的一段话就颇为典型地代表了后世儒者对孔子的景仰之情。他指出：“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于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矣。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至于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同样，作为20世纪的一位著名的儒家传人，第二代现

代新儒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唐君毅先生，对于孔子这位“至圣先师”也是充满了敬佩之情。在《孔子与人格世界》一文中，唐先生指出：“古人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旨哉斯言也。盖孔子之德慧，正在知彼云霞之七色，皆日光之分散；彼奇采之所自，乃无色之大明。唯此大明始终而日新，生命壮彩表现于人格人文之世界者，乃有所依恃，不息而生生。……于是，孔子之精神，乃御六龙而回驾，返落日于中天；融生命之壮采，咸依恃于仁体；任云兴而覆蔚，乐并育于太和。……现实世界由此得被肯定而有所依恃，而参赞化育，曲成人文，与夫利用厚生之事，亦皆可得而言矣。此孔子‘大明终始、云行雨施、厚德载物、含光弘大’之精神，所以为圆满也。”

正如里根先生所提到的，孔子人格生命的光辉不仅在于他“伟大的伦理道德思想”，而且首先在于他“高贵的行谊”。而事实上，在孔子的生命中，德与慧、仁与智、知与行是统合为一的。正是这样一个生命的统合体，在人类历史上矗立起了一座“人”与“仁”的丰碑。

三、艰难而执著的人生之旅

如果说，在孔子身后，他堪称是极备哀荣的话，那么，在孔子活着的时候，却是备尝坎坷艰辛的。正像宋明儒者们所形容的，“真正圣人临终未免也要叹一口气”，孔子正是抱着壮志未酬、“天下无道，莫能宗子”的遗憾而抱恨终天的。然而，也正是这一条多艰的人生之旅，鲜明地反衬出了孔子坦荡、执著而又中庸，集仁、智、勇于一身的生命形象，被后儒视为“人伦之至”。

孔子的始祖，传说可以追溯到商朝的创立者汤，所以时人称孔子为圣人的后裔。其先人曾是宋国的国君与贵族，后来为避难而逃到鲁国。到孔子父亲一代，家道已经衰微。加之孔子三岁丧父，以后由寡母一手拉扯大，孔子少时的贫贱是不难想见的。所以孔子说：“吾少而贱，故多能鄙事。”他不仅做过“乘田”（负责牛羊畜牧）、“委吏”（管理粮食收藏等）的小官，而且据说还做过专为贵族办理冠（古时男子20岁时举行的标志成年的仪式）、婚、丧、祭（祭祀天地山川、祖先、鬼神等）等事务的司仪。而这也就成了后世“儒”的意义来源之一。

孔子虽然自幼贫贱，但是他却聪明好学。他从小就跟着母亲颜征在认字、习礼，五六岁时，就能组织儿童模仿、操练一些典礼的仪式。从15岁起，他就明确地立志向学。或许是由于贫贱生活的磨练，少年时代的孔子自立志时起，就表现出了高远的抱负。由于当时是一个礼崩乐坏、战乱不已的时代，孔子之“志”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通过恢复“礼”来最终使得社会恢复到西周兴盛时期安顺和乐的状态。为此，他以周公旦所制订的西周礼乐文化的传人而自任，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文王即没，文不在兹乎？”孔子试图做一个周公式的贤相，以辅佐当世的圣君实现天下大治，使社会进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因而选贤与能、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就成为孔子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的重要内容。

由于孔子虚心好学，不仅谙熟有关周礼的各种礼仪典章种类、具体内容与操作程序，而且还在躬行践履之中不断修己体认，他很早就以“博学而知礼”成为鲁国的闻人。当他20岁生子的时候，鲁昭公即以鲤赐孔子以示庆贺，孔鲤的

名字即由此而来。最迟在 30 岁左右，孔子已经开始收徒授业。但是孔子并不安于独善其身，而是立志要兼济天下。不过一直到他 51 岁的时候，一展宏图的机会才降临到他的头上。这一年，鲁定公任用孔子为中都宰（即首都的行政长官），开始了孔子短暂而又辉煌的从政时期。先是“中都大治，四方则之”。一年后，孔子升任小司空，随即迁大司空并进而“摄行相事”即代理宰相职务。数年之内，孔子以其卓越的政治才干，在内政、外交、礼乐教化、行政制度等诸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所谓“闻政之日，鲁国大治，诸侯畏服”。这期间颇能体现孔子之智慧与勇气以及政治才干的事件是齐鲁之间的“夹谷之会”。

这一年，齐国由于惧怕“鲁用孔丘，其势危齐”，策划在夹谷这个地方举行齐鲁之君的“友好”会见，期望挟齐强鲁弱之势，以武力胁迫鲁君以捞取政治便宜。孔子“洞察其奸”，首先作了“武备”。在会见的过程中，孔子又数度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义正辞严地怒斥了齐人的越礼行为。最后终于使得齐国君“景公心忤”，不仅在会谈中不得不依礼而行，而且在回国后还“知义不若，归而大恐”，主动地归还了以前侵占的鲁地以谢过。由此孔子更是声名大动。

可惜好景不长。鲁国国君不久还是中了齐人的离间计，沉溺于齐人馈赠的女乐而荒于国事并开始疏远孔子。孔子不愿为了保守名位而苟且，于是愤而辞职并离开鲁国，寄望于在列国中寻找到圣王以施展自己远大的人生抱负。这就是孔子生命历程中悲壮而又执著的一幕——周游列国。

从 55 岁到 68 岁，孔子为了寻找施展抱负的用武之地而流离颠沛了 14 年，先后游说了 72 位国君与当政大夫。虽然大得名声，但是却也备尝艰辛。曾经见逐于鲁、被拘于匡、

削迹于卫、伐树于宋、被阻于蒲，穷乎陈蔡之间而弟子皆有菜色。而孔子也终于未能见用于当世，所谓“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的人生理想也终于再也没有尝试的机会。

然而生活的穷困并没有完全消磨掉孔子的志气，晚年的孔子一仍他素具的坚韧精神，在人生的道路上孜孜以求地执著追寻。就在他周游列国返鲁后短短的5年时间里，孔子成就了一项彪炳千秋的伟业：他继承了中华先民已有的传统典籍，以仁民爱物的高尚情怀，凝铸其一生奋斗的热忱与心血，通过因革损益而又“述而不作”，改定了六经，对于陶铸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在一定的意义上，的确可以认为，孔子是为中国文化这条“神龙”作了画龙点睛、开光点醒的工作。正是在对人生理想的不懈追求中，孔子燃烧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烛光，从而为后进者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四、生生而和谐的人文理想与圣之时者的人格精神

前文已经提及，孔子的思想与孔子的生命实际上是浑然一体的。孔子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对于自我人生经验的体悟，而不同于陶铸西方文化之基型的智者们主要是发展了一套抽象概念的反思、推演系统。这种体悟就使得孔子的思想与生命不能不是紧密相联的：一方面，孔子的思想正是从自我的生命经验中体知而来的；另一方面，孔子的自我生命又恰恰践行了他自己所提倡的生命智慧。由此，孔子思想落脚于一种生生而和谐的理想境界，而孔子的自我生命也同时表现为一种既积极入世、执著追求，同时又坦荡欢畅、温润中庸的

太和气象。

如果把儒学与其他文化系统加以比较对照，不难发现儒学的一个基本特质就在于它所发明的“仁”的境界与理想。事实上，“仁”也是《论语》一书中孔子论说得最多的一种德行。尽管这个词并非孔子所独创，但是，正是在孔子那里，“仁”首次标志了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孔子把周公以来，中国礼乐文化的内在根源归结为“仁”。在他看来，“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强调，“仁者爱人”。而且这种爱并不同于墨家爱无差等、爱人之父如己之父的“兼爱”，而是等差之爱的“推爱”。它强调从“亲亲”即亲爱与自己有血缘亲情的亲人开始，推而扩充到对自己所有的同类均保持一种温情与同情。孔子所揭示的“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是代表了对于人之类本质的中国式的解读方式，代表了人对于人之所以为人，所以“异于禽兽者”的一种自觉。由此出发，孔子不仅要求人要对自己的同类保持仁爱之心，而且进而要“上达天德”。他把天地最大的德行称之为“生”，认为天覆之、地载之，天成之、地养之，世间万物都是在天地之化育裁成之下才得以不断生长发育的；而这一片不息的生机正表现为天地生生之仁德。由此人之本性就与天地万物之性在本源上得到了贯通：就“仁”作为一种对于生命的肯定与培护的价值取向而言，它不仅是人的内在本性，而且也是天地之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在追寻人性之超越性的源头时总是强调，人之本性乃是“天之所与”的。

正是秉持这样的人生观，孔子即使是在最困厄的时候，也依然一仍坦荡、达观的生活态度，可以说真正做到了“君子坦荡荡”。“子畏于匡”，长时间没有解脱的办法，然而孔

子却依然镇定自若，连续七日“弦歌不绝”。受困于陈蔡期间，孔子与弟子“不得行，绝粮，病，莫能兴”（不能动弹），性急的子路甚至面有愠色，对“夫子之道”产生了怀疑。然而“孔子讲诵、弦歌不衰”，依然一付悠然自乐之态。在日常生活中，孔子即使吃着粗食、喝着冷水、枕着胳膊睡觉，“乐亦在其中”。之所以能够如此，正在于孔子通过充实自我的仁心，而达到了上与天地同流而下与万物一体的修养境界，从而能够一任生命的挥洒而知命达观、乐而忘忧，不为眼前的困厄所扰。

也正是由于抱有这样的仁者情怀，孔子执著的人生追求同时又并不表现为一种偏执，而是能够做到既中有所守而又通权达变，达到了和谐中庸之境。这样，孔子既以其自我的生命实践为儒者确立了生命形态的典范，同时又以“无可无不可”，“可以行则行，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而又“义之与比”的视听言动，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圣之时者”的生命形象。

纵观孔子的一生，可以说其生命形态正是践行了他自己“生生而和谐”的人文理想。孔子正是秉持一颗仁民爱物之心周游列国、四处游说，希望寻找到一展大同理想的机会。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堪称是代表了中国文化对于人格神宗教的基本态度，而这一态度的个中底蕴，也正是这一“生生而和谐”的人文精神。之所以敬鬼神，其中正包含了一种彻幽明、通物我的和谐取向。而之所以既敬之而又远之，并且终于没有发展出一种类似于西方文化中的既超越于人而又成为人类世界最终的价值之源的宗教，也在于按照“生生而和谐”的人文思想，只有万物的一体才是足以诚信的。而天心即人心、天性亦即人性，天与人、物与我打成两

概并非宇宙与自然的本来面目与圆满状态。生生而和谐，既由此积极入世，而又追求一种人与天、物与我的内在的和谐与贯通，其中实包含了孔子人生哲学的基本特质，同时也构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流之一的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中国式的人生哲学区别于西方式的人生哲学的重要特质。